



書叢學自年青

社會發展史綱

著 閻 華

行發店書活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歷史科學的任務

社會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實踐生活及其發展過程，特別是研究生產規律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規律底科學。在社會發展的諸時代中，不僅在形式上，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形態；而且在本質上，也表現為不同的諸構成。這是因為歷史上『任何事物，都不保持同一形狀與同一性質，常是運動着、變化着、消滅着、生長着，而各種相互關係及相互作用，都是無限的錯綜着』。歷史科學的任務，不僅要在把這些社會形態與構成依照其時代的順序加以排列，或是按其性質的異同加以分類而已。而是從人類實踐生活的發展過程之關聯中與變動中，即從人類歷史運動的總行程中，加以全面的分析，探求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根據這種規律，來說明並指導人類實踐生活之歷史的具體性及其發展動向。

我們知道：歷史不是故事小說和神話，所以它不是少數人『有趣的音樂』，而是人類為要促進社會的發展，在其生活的長期鬥爭中所留下的戰跡。社會一切文明的過程，都是勞動者的血與火的記錄

。換言之，歷史決不是人類精神和平進化過程之幽雅的牧歌，而是人類生活鬥爭及其革命的實踐所推進社會發展之一貫的全面的總述。法國偉大作家羅曼羅蘭說得好：『歷史不是軼事奇聞的蒐集，而是人類的體驗的總結算。關於這個體驗的正確的認識，不僅是照耀着過去，而且是啓發現在和指導我們的將來的。』正因為歷史自身不是一種自然的自發的運動，不是屬於和平的進化，而是從人類生活鬥爭發展出來的產物。所以歷史科學，也就是以說明人類生活鬥爭的實踐及其發展爲任務的『現實的及實證的革命科學』。

歷史科學是社會性的、階層性的。因爲在階層社會內只有階層的科學，它總是實應着一定的階層任務和階層利益以盡其職能。如果抹煞了歷史科學的社會性，這就等於否定歷史自身使之離開現實的真理。那些企圖消滅歷史科學之社會性的人們，就正是他們自己在歷史科學上之一定的階層性的實踐。因爲在各社會階層間執行相互鬥爭的場合，歷史科學根本就有其不同的階層性。在我們目前以整個民族去反抗日寇侵略的時候，歷史科學就具備着鬥爭的民族性。這種歷史家的階層性或全民性，正是生活的實踐。從而他們的認識，就多少要受到其自己集團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歷史條件所局限。馬克思對於這一點，曾經這樣說過：『人類僅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實行自我批判。……一待耶蘇教準備作某種程度的、或所謂自動的自我的批判，它便能够幫助我們達到對於以前的神話之客觀的認識。同

樣，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一經開始，資本主義經濟學，便也隨着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及東方的社會』。

馬、恩之所以致力於摩爾根「古代社會」的研究，他們研究了北美印第安人的民族社會，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及日爾曼人的封建主義，其目的是從現在的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形態，用來研究已經過去了幾千年乃至幾萬年從原始人類以來的社會發展。他們研究的結果，發現一件重要的事實，即私有制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是天生的永恆不變的體制。在它以前，曾經存在過無階層的原始共產社會之長遠的歷史。階層社會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總行程中，不過是歷史發展之一環或一個片斷，並且不可避免的就要隨着歷史的向前發展而歸於消滅。馬、恩實欲以私有財產、社會階層、和國家之起源與衰亡的歷史必然性和人類對於歷史的創造作用以武裝被壓迫的人類，使他們深刻地認識歷史的規律，和堅決地負起創立新的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歷史使命。同樣的道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史與列甯、斯大林對於帝國主義諸問題之深刻的研究，其目的也都是爲了變革歷史。

歷史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紀述及其指導，是概括過去全人類生活鬥爭與其創造之實踐的成果；尤其是階層任務的實踐，構成歷史本身運動的動力。因此，歷史科學的任務，就是要求對於整個世界史，從其聯系上、運動上、錯綜上、生滅過程上去理解，也就是要從歷史上各社會集團之相互鬥爭的具體

的歷史事實中，發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以這規律去說明人類在其過去所經歷之歷史的生活實踐的總體，並指出人類向前發展之歷史的前程。

第二節 幾種錯誤史觀的批判

恩格斯說：『前此人們對於歷史的見解，都根據這樣的觀念，就是：一切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應當求之於人們思想史的變動，即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政治變動是最重要的，決定歷史全部的東西。可是，這些思想從那兒來到人類頭腦中的呢？政治變動的推動因素是什麼呢？這些問題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見恩氏一八七八年寫的「馬克思小傳」）。一切史的觀念論者，從神學、玄學以至近代俗流的實驗主義，都一貫地把概念變成抽象的定義，變成心靈的產物，用「神」、「理性」、「道德」、「暴力」這些抽象的名詞，把歷史發展的法則，從具體的現實的歷史脫離，而且使歷史的概念與現實的歷史相對立。在人類歷史的研究中，盡量把人類歷史之階層的實踐內容隱蔽着，而把它神化爲觀念的範疇，因作出『理性支配世界史』的結論，思辯地構成其觀念的歷史史的觀念論，到黑格爾集其大成，他在其名著歷史哲學的緒言中說：『理性是一切現實所由之而有其存在，和有其生存於其中的實體。理性是無限的力，它自身啓示於世界，並且除了它自身，沒有別的東西啓示於世界』。在黑格爾看來，

歷不過是『理性的形象與行爲』，『世界史只是一種理性的現象，即理性在其中，啓示自己的特殊形態之一，就是在一種特殊原素，即各民族中表現自己之原始形態的複寫』。並由此而肯定歷史是無意識的，却必然地向着一個預先確立了的理性的目標進行，即向着絕對理性這個東西的現實進行。理性就是一個『神聖的預啓』，人類歷史，便是依照這個『神聖的預啓』之昭示而向前發展。史的觀念論者以爲『各原則都有其表現的世紀，比如強權的原則，屬於十一世紀；個人主義的原則，表現於十八世紀；所以是世紀屬於原則，並非原則屬於世紀。換言之，就是原則造成歷史，而非歷史造成原則』。

這種學說，現在還在以「新休謨主義」「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等名字，流行於英、美、法、德諸帝國主義國家。他們以生理史觀，物理史觀去研究歷史，他們以爲在一切社會現象中，可以看見的是影響個人的生理法則，所以研究任何社會現象，我們應由研究個人生活的法則開始。因而生理法則，即人類理性的自我發展，是社會之史的發展的基礎。他們把歷史發展法則，降爲生物，生理、或心理法則。於是，人類理性的發展，「個人心理」「羣衆心理」「民族心理」乃至自然環境對生理與心理的影響，成爲他們歷史研究的主题。至於那些法西斯歷史家的合唱隊，則索性現出反革命與反歷史的原形，撕下「理性」與「道德」的外衣，公開鼓吹『暴力支配歷史』的行動主義了！在這裡，日本歷史家秋澤修二等公然擁護日寇侵華戰爭，並無恥地說這種侵略戰爭爲「神聖戰

爭」，便是最明顯的實例。

在中國的史的觀念論，可以胡適的實驗主義及陶希聖的歷史循環論爲代表。胡適很坦白的承認觀念創造歷史，他說：『歷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擦脂抹粉』；又說：『歷史好比是一百個大錢，任你如何去擺』；又說：『歷史好比是一塊大理石，任你如何去雕琢』。總括地說，胡適以爲歷史是觀念的構成，人們可以依據其各人不同的觀念，爲所欲爲地創造其自己所願意的歷史。

另外有些人則雖反對史的觀念論，雖然看出了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但他們却把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解釋成爲地理史觀與人口史觀，結果依然得不到正確的結論。正像「聯共（布）黨史」所闡明：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底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當然影響到社會之發展——它可以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底進程的。然而它的影響，並不是有決定作用的影響。因爲社會之變更和發展，是比地理環境之變更和發展，迅速得不能比較的。在三千年中間，在歐洲，更換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隸佔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歐洲東部，在蘇聯，甚至於更換了四種社會制度。可是，在這同一時期內，歐洲境內的地理條件，或者是完全沒有變更，或者是變更得如此之小，甚至連地理學都不值得提及。由此可見，地理環境決不能成爲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不能有決定的作用。因爲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是不能成爲那在幾百年或一兩千年間就發

生根本變更的現象之發展的主要原因的。

其次，毫無疑義的，人口是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之必要因素，人口之增長，當然是影響到社會之發展，是促進或延緩社會之發展的。然而，它也不能成爲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和決定的力量。因爲假使人口之增長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一定應當產生與之相當的較高樣式的社會制度。可是在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的情形。中國人口密度是高過美國四倍，可是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比中國爲高，因爲在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制度佔統治，而美國却是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了。比利時人口密度是比美國高十九倍，比蘇聯高二十六倍，可是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高過比利時，而蘇聯則較比利時高出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爲在比利時是以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而在蘇聯。則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並在它本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而向共產主義邁進了。由此可見，人口之增長，並不是而且不能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力量。

第二節 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

既然如此，那末，決定着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即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究竟何在呢？

這樣的力量，據歷史唯物論看來，就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底獲得方式，即生產方法。這一發現，首先是馬克思的功績，所以列甯說：『由於馬克思，社會歷史的研究才變成科學』。馬克思說：『人類爲了創造歷史，必須處於獲得生活的狀態之下，這就是一切歷史之第一前提。因而作爲人類之中心，便是他們之物質生活的生產，這就是人類之第一次歷史行爲。人類之歷史的行爲——物質的生活資料之生產，畢竟是歷史的根本條件』（見「德意志觀念形態論」）。後來經過恩格斯，列甯，斯大斯的繼續發展，歷史科學又被提到更高的階段，尤其在最近出版的「聯共（布）黨史」中，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獲得了有最大光輝的成果。它根據上述命題，更具體的指出：人類爲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靴鞋、房屋、燃料等等；爲要有這些物質資料，就要生產它們。而爲要生產它們，就要具有那些被人們利用來生產食品、衣服、靴鞋、房屋、燃料等等的生產工具，就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就要善於利用這些工具。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們——所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就構成社會底生產力。

然而，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和生產方法的一方面，生產和生產方法另一方面，則是人們彼此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即人們的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不受剝削的人們間的合作關係和互助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這些關係，也可以是由一個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個生

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係。然而，不管生產關係帶着怎樣的性質，可是它們總是構成生產的必要因素，正好似社會的生產力一樣。所以，生產，生產方法，是既包括着社會的生產力，又包括着人們的生產關係，因而就是它們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的體現。「聯共（布）黨史」在闡明上述關係之後，並特別指明生產的特點如下：

生產底特點之一，就是它永遠也不會在長時期內停留在一個地點，而是時刻處在變更和發展情況中。而同時，生產方法中的變更，又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政治觀點，政治組織之變更，即引起整個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之改造。

所以，社會發展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史，就是在數千百年新陳代謝的生產方法發展史，就是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就是勞動羣衆——他們是生產過程之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爲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之生產——底歷史產。這就可以說明：歷史科學，如果它想成爲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歷史作爲帝王和將相的家譜，以敘述少數英雄偉人的行動爲滿足，而是應當首先就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各國人民的歷史。由此可見，研究社會歷史底規律的關鍵不是要在人們底頭腦中，不是要在社會的觀點和觀念中去探求，而是要在社會每個一定歷史時期所採取的生產方法中，在社會經濟中去探求。

生產之第二個特點，就在於生產之變更和發展，無論何時都是從生產力之變更和發展、首先就是從生產工具之變更和發展而開始。所以，生產乃是生產底最活動的最革命的因素。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變更和發展，而然後，依賴于這些變更並與之相適應的，就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也發生變更。可是，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到生產力之發展。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于生產力之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又反轉來影響到生產力，或加速其發展，或延緩其發展。而且必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太長期落後于生產力底增長並和這增長相矛盾；因為生產力，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于生產力底性質及情況，並給生產力以發展餘地時，方能儘量地發展。如果不然，那我們就會看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生產系統中的統一之根本破壞，經濟危機，生產力之毀壞。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之不相適合的實例，它們兩者間衝突的實例，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於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是和產生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處在極不相適合的地位。而這種不相適合的結果，就是使生產力陷于破壞的經濟危機。反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完全相適合的實例，就是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在蘇聯，對於生產資料社會公共所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完全相適合。因此，在蘇聯，既沒有經濟危機，也沒有生產力破壞的現象。

生產之第三個特點，就是新的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合的生產關係之產生，並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的，並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才發生的，而是在舊制度母胎內部發生的。同時，『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還給一切生產力以發展餘地，而這一切生產力尚未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其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尚未在舊社會胎包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無論何時都只是給自己提出自己所能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一看，那就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能藉以得到解決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着，或至少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可見到一定時期為止，生產力之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方面之變更，是自發地、不依賴于人們意志而進行的。然而這只是到一定時期為止，只是到那已經產生和正在發展的生產力尚未及充分成熟的時期為止。而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後，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統治階級，就變為阻礙生產發展的桎梏。而要打破這個桎梏，就只有經過新階層之自覺的活動，經過新階層之強力的行動，經過革命，才能做到。在這裡，『新的社會觀念、新的政治組織、新的政權底偉大作用，就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其使命就是要用強力來廢除舊的生產關係。於是，發展底自發的過程，就讓位于人們底自覺的活動，和平的發展就讓位于強力的大變革，進化就讓位于革命』。

第四節 下層基礎與上層諸建築之辯證的統一

說到這裡，自然而然便又接觸到了新的命題，即上層建築物與下層基礎的關係問題。我們知道：『既當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性的現象，是從生的現象；既然物質世界是不依賴于人們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象，而意識則是這客觀現實之反映，那末由此可見，社底物質生活，社會底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社會底物質生活，乃是不依賴于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這客觀現實之反映，存在之反映。由此可見，社會底精神生活藉以形成的來源，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藉以產生的來源，不應到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中、社會存在中去探求、因為這些觀念、理論、觀點等等，乃是這社會存在之反映』。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曾說過下面幾句名言：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多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適合于他們的物質生產力底一定的發展階段的。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社會底經濟結構，即現實的基礎，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

樹立起來的，同時，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和這個基礎相適合的。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一般社會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而是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

但是我們不應當像機械論者那樣，從馬克思這段話裏就作出結論說：社會的觀念、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在社會底生活中沒有意義，說它們不反轉來影響到社會的存在，影響到社會生活底物質條件之發展。因為馬克思在這段話裏只說到關於社會的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之起源，關於它們的產生，關於社會底精神生活是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之反映。至于說到社會的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底意義，以及說到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馬克思和一切歷史唯物論者都不懂不否認，而且恰巧相反，正如上節末段所說一樣，還着重指出它們在歷史發展中的嚴重作用和意義。這裡我們只要看一看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給布洛赫的信裡對於這一問題的聲明就够了：

『依據唯物論的歷史觀，歷史上最終極的決定的契機，是現實的生活之生產及其再生產，馬克思和我的主張都不過如此而已。倘若有人把它這樣來曲解，而說經濟的契機，是唯一的決定的契機的話，那命題就會轉化為無價值的抽象的悖理的空辭。經濟狀況是根基，但上層建築的諸契機——如階層鬥爭之政治的諸形態及諸成果，勝利的階級于戰後所定的憲法，法律的諸形態，以及這些

現實鬥爭之參與者的頭腦中的反映，即政治上、法律上、哲學上之諸理論，宗教的見解，及其更形發展而生的教義之諸體系等等——在歷史鬥爭的過程中，都有着它們的作用，而且在許多場合還能有力地決定着它們的形式。這一切的契機有着一種交互作用，在這裡面，經濟的運動是通過了無限量的一切偶然性，而終於作為必然性貫徹着」（見「馬恩通訊集」）。

「聯共（布）黨史」根據新的革命鬥爭經驗，對這一點亦有深刻的發揮，茲錄其要點如下：新的社會的觀念和理論，只有當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之後，才產生出來。然而，當它們已經產生出來之後，它們就成為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由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之向前進展。正是在這裡，就表現出新觀念、新理論、新政治觀點、新政治組織底最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以及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之所以產生出來，就是因為它們是為社會所必需，因為如果沒有它們的組織的、動員的以及改造的工作，就沒有可能來解決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既然已在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它們就給自己開闢道路，而變為民衆所享有的東西，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去反對社會裡正在腐朽的勢力，並造成必要的條件，以便徹底解決社會底物質生活中之已經成熟的任務，並使這社會底物質生活之向前發展成為可能。

第五節 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舊的歷史家都是按着個人的動機來判斷歷史，他們以爲決定歷史發展的，是那些偉大人物個人的理想、動機或企圖，他們並不再進一步去探求推動這些個人的理想、動機或企圖的是什麼？他們不能了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某些傑出人物個人的動機；但是在實際上，這些所謂歷史上某些傑出人物的動機，決不是代表着他個人的意志，而是代表着某一民族全體，或某一民族中的一個整個階層的一致的生活的要求。不管這個傑出人物自己的意志如何，然而只有當他這一動機是反映着大眾的生活的要求的時候，才能推動歷史的發展。換言之，所謂個人的動機，事實上乃是一個民族或一個階層的整個的生活的要求之綜合，通過這些傑出人物的頭腦，而變爲民族意識或階層意識，然後這些傑出人物再以這種民族意識或階層意識去領導全民族或全階層，從事實現這一大眾的要求的鬥爭。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曾這樣指出過：『在歷史人物動機的背后，自覺地或不自觉地總隱藏着一種動力，這動力，也許是歷史的真正的基本的動力，但究竟這種動力，其意義却不是指個人（即使是傑出的個人）的動機，而是指推動廣大羣衆（整個民族或某民族中整個階層）的動機。並且這裡最重要的不是短時的爆炸，也不是轉瞬即滅的火星，而是足以引起偉大的歷史轉變的持久運

動。探討那以自覺的動機方式，在羣衆和領袖（即所謂傑出人物）頭腦中，或明瞭地、或模糊地、或直接地、或間接地在思想的形式上，甚至在幻想的形式上，反映出來的原因；這就踏上了導引我們去認識支配一般歷史，以及歷史各個時代或各個國家的法則的唯一道路」。由此可見，如果傑出人物的觀念和願望是違反着社會底經濟發展，是違反着先進階層底要求，那他們就會變成廢物。反之，如果傑出人物底觀念和願望，是正確地表現社會經濟發展底要求，先進階層底要求，那他們就能成爲真正卓傑的人物。

翻開中國的歷史，從有史以迄于民國，可以說都是以個人爲中心，直等於歷代帝王的家譜。此外又益以傳記年譜之類，專述個人的生活。對於這五千年來創造歷史偉蹟的人民大眾，以及他們的生活的變遷，差不多置諸不論之列。因此，過去的史學界視帝王爲天之驕子，神的代表，依其喜怒，以創造歷史，如胡適所云：『個人吐一口痰，都可以引起幾十年的戰爭。』把歷史發展的動力，完全建築在個人的機動上，而不建築在大衆的創造上，這自然是絕對的錯誤。但是，現代的新史家，知道用社會的眼光來觀察歷史，從事于社會經濟之史的發展的研究，這自然是一大進步；但若因此忽略了社會與其『仲介人』之關聯，根本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也爲一不能容許的錯誤。其實馬列主義者從來沒有否認過個人對歷史所演的偉大作用。革命是歷史的發動機，是胚胎于舊社會內的一種新制度的接